

目 录

导言	杨伯峻 (1)
《周易》	杨伯峻 (7)
《尚书》	刘起鈇 (20)
《诗经》	阴法鲁 (29)
《周礼》	金景芳 (42)
《仪礼》	王文锦 (51)
《礼记》	王文锦 (61)
《春秋》	杨伯峻 (70)
《左传》	杨伯峻 (77)
《公羊传》和《穀梁传》	杨伯峻 (86)
《论语》	杨伯峻 (98)
《孝经》	杨伯峻 (105)
《尔雅》	陆宗达 王 宁 (111)
《孟子》	杨伯峻 (124)

导 言

杨 伯 峻

一、一点说明

这里谈的“经书”，其实就是“十三经”，它是自宋朝以来确定的，到今天还习以为常，不是有《十三经白文》、《十三经索引》、《十三经注疏》等等可以为证吗？这是“儒家”的经典。拆穿西洋镜，也不过那么回事。

经书浅谈，只限于浅谈各种“经书”的主要内容，著作年代，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着手，如何深入。在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点看法，同时扫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碍。

二、“经”名考

为什么叫“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各种说法撇开不谈，专从历史考据上讲讲这问题。“经”作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桴”。这是讲吴王夫差要和晋国决一胜负的战前情况。韦昭注说：“经，兵书也。”而清末俞樾却认为“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依俞樾说，“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但剑不插在剑鞘里，偏要挟在腋下，不但古代无此说法，而且捶鼓也难以使劲。俞樾的说法有破绽。总之，面临交战，挟着兵书临时请教它，自未免

可笑，俞樾这一驳斥还是有道理的。因之，《吴语》的“经”，我们不看做“兵书”。《墨子》有《经》上、下篇，也有《经说》上、下篇。《经》的文字简单，甚至三四个字便是一个命题。《庄子·天下篇》说墨学弟子徒孙都读《墨经》，可见“墨经”之说起于战国。《经说》便加以说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经》，不知《道经》是什么时代的书。《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下，和《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经”和“说”，可能是仿效“墨经”的。可见，“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礼记》有《经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启发的。至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一类医书，因为那是后人伪作的，便不讨论了。

由上所述，“经”名之起，不在“儒家”。“经”的意义，也未必是用它“经常”的意义，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今文派”认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经”，他们不懂，“经”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经”名之起，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大概起于“墨经”，不起于孔子。后代把“经书”这一“经”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说叫做“佛经”，伊斯兰教有《可兰经》。道教称《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抱朴子·外篇·勸学第三》也有这一说法。在考古发掘中，无论竹简木札或帛书，只有用丝线和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残迹。“经”本是丝织之名，是否因以丝织物装成册而给以“经”名，前人多主此说，但也难以肯定，因为用丝、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不止“经书”。

把“儒家”书籍说成“经”的，开始见于《庄子·天运篇》：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似乎“六经”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说。如果这说可信，甚至“六经”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说我研究这“六经”。可惜的是《庄子》这部书，自己也说“寓言十九”^①，不尽可信。但总可以证明，在战国时，儒家已有“六经”。《庄子·天下篇》更进一步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几句话意思是：“《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礼》讲的是应对进退、周旋揖让，《乐》讲的是声音和谐，《易》讲的阴阳，《春秋》讲的是君臣上下。这种道术分布在四方而在诸侯各国中有所表现和设施的，各家各派有时有人称道它。”这样一说，“六经”不但是儒家所专有，而且它是以后“百家争鸣”的学术源泉。汉代尊经，据郑玄说，“六经”的竹简长二尺四寸^②。从1959年7月在甘肃武威汉墓所出土的竹、木简的《仪礼》看来，这话是可信的。

三、《十三经》的完成经过

如上所说，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③。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我还猜想，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属于“音乐”一类，已

① 见《寓言篇》。

② 见《仪礼·聘礼》贾公彦《正义》引郑玄《论语序》。

③ 见贾谊《新书·六术篇》。

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国的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缛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至于东汉末年曹操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他还能记出《诗经》中四篇乐谱，我却认为，杜夔所记出的《诗》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

“六经”的次序，据《庄子·天运》和《天下》、《徐无鬼》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泰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序》，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唯《荀子》和《商君书》没谈到《易》）。但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以至现在的《十三经》都把《易》改在第一。为什么到后汉时把“经书”的次序移动了呢？很可能他们认为“经书”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应该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诗》有《商颂》，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列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为鲁史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列在第六。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mi)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未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三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这便是《十三经》成立的大致过程。

《十三经》长短大不相同。长的如《春秋左氏传》，连“经”带“传”，合计十九万六千多字；其次是《礼记》，有九万九千多字。最短的是《孝经》，仅一千八百字。《孝经》自汉朝以来，一般不用它为科举考试的书。唐朝科举，沿袭隋炀帝的制度，有明经科，专考九种经书。因经书有长有短，便规定《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宋朝虽然废除了明经科，但没有废除以经义考士人，便以《诗》《礼》《周礼》《左传》为大经。

在《文史知识》上陆续刊载了关于《十三经》的介绍文字，那是以成文先后为次序的。现在辑为一个小册子，便改以《十三经》原来次序为先后。

浅谈“经书”，并不容易。要用通俗的语言，简短的篇幅，介绍某一“经书”的繁复内容和来龙去脉，又要作适当的评价，并大致讲讲今天怎样看待它，怎样研究它。作者首先要对所介绍的书，有相当正确而深入的理解，详细阅读这部书的古今有关著作，胸中有主张，才能构思着笔。我们几人，分工合作，都自己忖度，水平有限，很难达到广大读者所抱的期望。但迫于《文史知识》负责编辑的催促，于百忙中抽出时间，仓卒成篇，错误和遗漏自然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改和补充。

《周易》

杨伯峻

第一节 《周易》本是占筮书

古代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情况和规律极其缺乏认识，因之产生不少迷信活动。卜和筮(shì)便是一种迷信。尤其是上层人物，什么举动都得先请教神灵，问问吉凶。卜用乌龟腹甲或者牛胛骨，自清代末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首都旧址)发现大量卜辞以来，为研究中国殷商史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最近在陕西扶风县、岐山县一带，即西周建国前的周原地区，又发现周代卜甲、卜骨，虽然数量不大，却很有价值。用实物证明了西周在建国前，即武王灭纣以前，早就用龟甲牛骨占卜了。以后又用蓍(shī)草卜卦，叫占筮。《周易》这部书，就是提供占筮者用的。《周易》就是今天的《易经》，又简称《易》。

蓍草就是民间通称的蚰蜒草或者锯齿草，用它的茎作占筮工具。大概用蓍草茎五十根，又抽去一根，得四十九根，分别数它们的数目，把它们分为几份，这叫做“揲”(shé)，然后成卦。要揲好几次，由原先的卦再看它又变成什么卦，最后参考占筮书，来预测吉凶。

传说占筮书有好多种，从《左传》和《国语》这种春秋史书来考察，一般用的是《周易》。也有一些不见今本《周易》的语句，或许用的是《周易》以外的占筮书。至于《周礼·春官·大

《太卜》所说的《连山》、《归藏》二种占卦书，谁也没有见到过，《北堂书钞》一〇一卷引桓谭《新论》说：“《厉山》（即《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但刘向、刘歆父子校讌中秘书，班固著《汉书·艺文志》，不加著录，桓谭当时仅仅一小官，怎么能看到？还说什么“《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①，我认为难以相信。现存《连山》、《归藏》是假货，就不必说它了。

第二节 《周易》内容

《周易》最基本的东西是“阴”“阳”两个符号，“—”是“阳”，“--”是“阴”。由这两个符号，连叠三层，组成八卦：☰（乾）、☷（坤）、☵（坎）、☳（震）、☴（巽）、☲（离）、☶（艮）、☱（兑）。这八个卦，互相重叠，又组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爻（yǎo），从下往上数，第一爻叫“初”爻，第二、三、四、五爻仍用“二”“三”“四”“五”为名，最上一爻叫“上”爻。那一爻若是阳爻“—”，便叫“九”；阴爻“--”，便叫“六”。初爻叫“初九”或“初六”，最上一爻叫“上九”或“上六”。其余的便是“九二”或“六二”，“九三”或“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六爻的（本三百八十四爻，再加上《乾·用九》、《坤·用六》二条爻辞）爻辞，是《周易》“经”的部分。又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

《周易》有“经”，自然有“传”。《易传》有七个部分，十篇，所以叫做“十翼”，意思说这十篇文字是“经”的羽翼。《十翼》七种十篇是：

一、《彖（suàn）传》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卦辞》的，

^① 《太平御览》六〇八卷引。

分上、下两篇。彖即断也，断定一爻之义。

二、《象传》，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爻辞》的，也分上、下两篇。

三、《文言》，只解释《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

以上三种，本来是和“经”分离各自单独为篇的，后人因为它和“经”文关系较为密切，便附在各有关“经”文之下。“经”分为上、下，因此《彖传》、《象传》也分为上、下。《文言》，只各附于《乾》、《坤》两卦《象传》之后，这两卦都在上篇，不能再分为上下了。

四、《系辞》，它是《易经》的通论，内容比较庞杂，篇幅也较长，所以也分为上、下两篇。

五、《说卦》，主要记述乾、坤、震、巽(xùn)、坎、离、艮(gèn)、兑八卦(这八卦也叫“八经卦”，因为是由它组成六十四卦的。六十四卦，经过“经卦”的重叠，又叫“别卦”)所象的事物。《说卦》说：“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是原始卦象。《说卦》又加引申，一个卦可以代表多种事物。

六、《序卦》，解说六十四卦的顺序。

七、《杂卦》，解说六十四卦的卦义，却不依照六十四卦的顺序，错杂解释，所以叫“杂卦”。

以上四种各自独立为篇，列于“经”文之后。本来“经”自“经”，“传”自“传”，今本《周易》把《彖传》《象传》《文言》各附于相关“经”文之后，而把《系辞》以下四篇列在“经”后。有人说，这是由西汉《易》学者费直干的，初见于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又有人说，开始于东汉末的郑玄，见于《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因为《三国志》是晋人陈寿所著，在唐以前，

应该相信它。

第三节 《周易》“经”的写作时代

依上节所叙,《周易》先得画卦,然后重卦,才能有《卦辞》和《爻辞》。谁画的卦?谁重的卦?传统说法是伏羲氏、神农氏,这当然不可信。伏羲、神农这类人,只是战国以后传说中的人物。但画卦、重卦必然在作卦辞、爻辞之先,现在没有确凿资料得据以推论是谁所为,只好存而不论。

从《卦辞》、《爻辞》看,《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因为它所载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代初年的史事,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

一、《丰·初九爻辞》说:“虽旬无咎。”意思是“纵是十天,不会有祸害”。这个“旬”字,是从殷商承袭下来的,甲骨卜辞有大量“卜旬”记载,到西周中叶以后便不大有人知道了。

二、《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旅·上九爻辞》“丧牛于易。”“易”是地名,在易地丧失了牛羊,这是殷商祖先王亥的故事,从前人们都不清楚,自卜辞大量被发现,经王国维仔细研究,才从若干古书结合卜辞钩稽出来。《爻辞》用了这个故事,可见它写作时代的早。

三、《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二处都讲到高宗伐鬼方,是殷商的历史。

四、《泰·六五爻辞》和《归妹·六五爻辞》都说“帝乙归妹”。帝乙是商纣的父亲,“归妹”意思是“嫁女”,帝乙把少女嫁给文王,可以和《诗·大雅·大明》互相印证和补充。

五、《晋·爻辞》:“康侯用锡马蕃庶。”这是说武王之弟康

叔被封于卫，饲养周王朝所赏赐的马，日益繁衍。

六、《升·六四爻辞》：“王用亨(享)于岐山。”《随·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这两个“王”字，都是指周文王。周文王在生前已称为文王，王国维有考证，更得到周原卜辞的实证。

七、《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yuè)祭，实受其福。”“东邻”指殷商，“西邻”周王国自指。杀牛祭鬼神，可说恭敬了。禴祭仅用饭菜，不杀牲。殷纣虽杀牛以祭，不如周文王的薄祭，鬼神反而使他受福。

另外还有不少故事，因为情况后来失传，现今很难搞明白，暂且不谈。从上面所述，最早有殷商祖先丧牛羊于易的故事，其次有高宗伐鬼方以及帝乙嫁女的史事，又有卜问的风气，最晚的故事是卫康叔饲养马群，那是周朝已灭纣统一天下了。《卦辞》《爻辞》没有后来盛传尧、舜禅让的事，没有讲商汤、周武王“革命”的话，没有讲封(皇帝登泰山祭祀)禅(祭祀泰山南的梁父山)，没有讲观象制器(见《易·系辞》)，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盛行的传说，而在《卦辞》《爻辞》中不见半点影子，足以说明《卦辞》《爻辞》写作较早。《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耶？当文王与纣之时耶？”怀疑《卦辞》《爻辞》作于周文王之世，但从“康侯用锡马蕃庶”这一条看，自在文王以后，许多研究《周易》的人大多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的作品。

第四节 古人如何用《周易》占筮

从《左传》《国语》诸书看，古人用《周易》占筮，并不拘泥于所占得的《卦辞》或《爻辞》；就是说，《周易》说“吉”未必吉，说“凶”未必凶。却能结合占筮者的当时情况，以人事来作近乎合理的判断。后代有些“算命”“看相”“卜卦”的敛财者，其中

有些机灵人，能从种种迹象推测出一些结果，因此被人迷信。譬如《左传》襄公九年，鲁国穆姜筮得随卦，原文是“随，元、亨、利、贞，无咎。”这自是吉卦。可是穆姜结合自己的行为，认为自己没有“元、亨、利、贞”四种品德，尤其是不安于本位，和人私通，扰乱鲁国，完全不合随从之德，因此自己作出判断说：“我皆无之（元、亨、利、贞四德），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穆姜果然死于被迁移的东宫。又如鲁季氏臣南蒯，要背叛季氏，先占筮，得到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南蒯自认为这是大吉大利，请教占筮专家子服惠伯。子服惠伯却说：“我曾经学习过《周易》，你这次占筮，用于尽忠和诚信的事就可以。不这样，一定失败。”古人认为背叛是不忠不信，结果南蒯失败，逃到齐国。这事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到十四年。又如据《国语·晋语四》，晋文公占筮能不能返回晋国为君，也用《周易》，得“屯之豫”（即原文的“贞屯悔豫皆八也”，此用《左传》术语）。占筮之官说“不吉”，司空季子却说“没有比这卦更吉利的”。可见同一占筮，解释竟相反。不是《周易》真灵验，而是解释者是否能结合事理加以推断。可见古人对于《周易》，能够灵活运用。

第五节 《十翼》各篇的写作时代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引《系辞》称为《易大传》，所以后人称《十翼》为《周易大传》，相传为孔丘所作，那是毫无道理的。从宋代欧阳修作《易童子问》，便提出许多论点，说明是孔子以后的作品。以后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论证《十翼》不是一人所作，而且不是一时所作。各篇写作时代不同，略略论断于下。

一、《彖传》，这篇写得最早，它只解释卦和《卦辞》，自应

较其他为早。因为它已经解释了《卦辞》，所以《象传》便不再解释《卦辞》，而只解释爻和《爻辞》。它有不少用韵处，但《卦辞》《爻辞》与《诗经》用韵不同，而接近于《楚辞》以及《老子》、《庄子》的用韵。以时代论，近于战国；以地域论，近于南方。

二、《象传》，它的解释有和《彖传》很不一致的地方，足见它的作者不是《彖传》的作者，而且很不及《彖传》的作者。《艮·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君子思不出其位”是孔子学生曾参的话，见于《论语·宪问》。《象传》这句话是直接袭用《论语》，可见《象传》之作在《论语》流行以后。但又在《礼记·深衣》以前，因《深衣》曾说：“故《易》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六二之动”二句，正是《坤·六二爻辞》下的《象传》。由此可以推断《象传》很大可能是战国中到晚期作品。

三、《文言》曾经抄录《左传·襄公九年》鲁穆姜解释《随·卦辞》“元亨利贞”四个字，自然着笔在《左传》流行以后，最早也不过战国晚期。

四、《系辞》中有些话曾被汉初人所引用。如“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陆贾引入《新语·辨惑篇》；“天垂象，见吉凶”，又引入《新语·明诫篇》。司马谈引“天下同归而殊途”，见《史记·司马迁自序》。“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为董仲舒对策所用，见《汉书·董仲舒传》。“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为《韩诗外传》卷三所征引。足见《系辞》作于西汉以前。而且《系辞》开始“天尊地卑”二十二句，《礼记·乐记》也有大同小异的语句，是《系辞》用《乐记》，还是《乐记》用《系辞》，难以肯定。而从文从理顺看，《乐记》抄袭《系辞》的可能性大。那么，《系辞》更作于《乐记》之前，至迟当为战国晚期的作品。有人说，《系辞》不作于一人一时，系拼凑而成的，“观象

制器”一段有抄袭《淮南子》的嫌疑。这种话,目前只能存疑。

五、《说卦》、《序卦》、《杂卦》三篇,写作更晚。三篇之中,《说卦》很可能较早。总之三篇或许在汉初,或许晚到汉宣帝。

第六节 怎样看待《周易》

《周易》本是占筮书,犹如近代的《牙牌神数》之类的书。牙牌神数是用三十二张骨牙牌或者木制牌占卜的。假如你得了个“上上,上上,下下”,自然是先吉后凶,打开《牙牌神数》便看到四句话:“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是用项羽败于垓下,自刎乌江的故事作譬,容易懂。而《周易·卦爻辞》,作于周初,便不好懂。不仅我们今天隔《卦爻辞》的写作大概三千年,很难透彻了解它,就是只隔几个世纪的春秋时代,也有时误解《周易》原文。譬如《周易·随·卦辞》“元亨,利贞”,经我们对《卦爻辞》本身的排比归纳的研究,加以甲骨卜辞的证明,毫无疑问地应该把“元亨”作一读,意思等于“大吉”;“利贞”作一读,“贞”是“卜问”之义^①，“利贞”，可以释为有利于占筮或占筮者。但在公元前564年,即《左传》鲁襄公九年,载鲁国的穆姜被迫迁居东宫时,得“艮之随”(由艮卦变成随卦),穆姜便把“元、亨、利、贞”四个字拆开,一个字一个字讲解,说:“脑袋是躯体的最高处,亨宴是宾主的盛会,利是义的总和的体现,坚贞信实是作事的骨干。”把“元”读为“狄人归其元”“勇士不忘丧其元”“元首”的“元”;把“亨”读为“享”,享宴之意;把“贞”解为“坚贞”、“贞信”,都离开原义很远。《十翼》有很多是战国时作品,但也不很理解《卦辞》《爻辞》。以《象传》而论,有的解释等于没解释,简直是交白卷。如《复·六三爻

^① 《说文解字》。

辞》：“频复，厉，无咎。”《象传》说：“频复之厉，义无咎也。”只是照抄原文，加了三个字，三个字中还有“之”“也”两个虚词，这岂不是说了等于没说。这类例子很多。《文言》又把穆姜“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等等的話照抄一遍，不是也对“元亨利贞”加以误解么？总之，《卦辞》《爻辞》的正确解释应在《卦爻辞》本身去求，《十翼》，除《彖传》较可参考以外，其余多半是其作者一人之私言，并不完全足以作《周易》经文的正确解说。

孔子读过《周易》，《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研读《易》，把连缀简册的柔牛皮条都弄断了好多次，可见他研读的勤快。《论语·述而篇》引孔子的话：“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还说过：“五十而知天命”^①，自和他学《易》有关。还引《周易·恒·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句话意思是：“三心二意，翻云覆雨，总有人会招致羞耻。”孔子于是说：这是叫无恒之人不要占卜罢了^②。由此可见，孔子把《周易》看成一部哲学书，并不曾看成一部占筮书。

汉朝人解释《周易》，离不开“象”和“数”。“象”有二种，一是卦象，包括卦位，如《左传·昭公五年》叙述鲁叔孙穆子初生时，穆庄叔用《周易》给他占筮，得“明夷”（离下坤上）之谦（艮下坤上）。卜楚邱有这样的话：“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离火，艮山”，这是卦象。又如《左传·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征伐晋惠公，秦国卜徒父筮之，得蛊卦（巽下艮上），说：“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内卦（下体）叫贞，外卦（上体）叫悔，这是占筮术语。所谓“贞”和“悔”便是卦位，

① 《论语·为政》。

② 《论语·子路》。

“山”和“风”便是卦象。“象”的另一意义是爻象，就是阳爻和阴爻所象的事物，可不再举例了。“数”的意义，一是阴阳数，奇数是阳数，如乾卦“☰”三画为阳卦，坤卦“☷”六画为阴卦。以爻数论因为“—”是一画，所以叫阳爻；“--”有二画，所以是阴爻。又以爻位论，以爻的位次论，初爻、第三爻、第五爻，若是阳爻“—”，叫“当位”，二、四、上(六)爻若是阴爻“--”，也“当位”。不然是“不当位”。总之，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位当阳爻，阴位当阴爻，说这是正常(或者“合理”)情况。这不过是个大概。又有讲“爻辰”的，就是用阳爻和阴爻配合子、丑等十二辰来论断吉凶。还有讲“互体”的，即在六十四别卦中，二到四爻，三到五爻两体相交，各成一卦。讲“象数”的，大体还和《国语》、《左传》所叙相近，讲“互体”、“爻辰”的，便疏远了。到三国魏末，王弼注释《易》，开“玄学”之风，扫除术数(即上述“象数”“互体”“爻辰”之类)，便把《周易》之为占筮书变为哲学书。宋朝道士陈搏又创为“先天”、“后天”、“太极”、《河图》、《洛书》之说，把《周易》变为方士书。还有不少五花八门讲《易》的书，我认为对研究《周易》都价值不大。

《周易》本是占筮书，应该还他本来面目，无妨仍把它看成古代占筮书。这是古人迷信，但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探讨古人的历史、风俗和古文字以及《周易》经文的历代变化情况。譬如“丧羊、牛于易”的故事，出于殷商祖先王亥，由《周易》得到印证；帝乙归妹，可以和《诗·大明》相证。还有许多故事，如《同人·九三爻辞》“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坎·六三爻辞》“系用徽纆(mí)，寘(ɡuì)于丛棘”、《明夷·九三爻辞》“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睽·上九爻辞》“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离·九三爻辞》“不鼓缶而歌”这些篇章里面，一定都有故事，可